

日本侵华战争的军事战略分析

蒋立峰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大规模侵华的开始。分析九一八事变前后及整个日本侵华战争的军事战略，对于认识日本军国主义的本质和必然失败的命运具有重要的意义。

“北进”与“南进”之争

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外军事战略思想首先表现在“北进”与“南进”之争上，这两种战略主张之间的争论，不仅决定着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方向，而且对日本侵华战略方针的演变也具有深刻影响。

“北进”与“南进”之争由来已久，早在明治时代前期就已出现。通过改革和掠夺而实现初步富强的日本，是通过朝鲜向中国东北、蒙古和西伯利亚“发展”，还是利用海洋国家的优势以琉球群岛为转运基地一步步向南方“发展”，这两种主张各执一端，长期未能统一协调。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强占了中国的台湾及澎湖列岛，对其向中国南方的福建、浙江以及菲律宾、印度支那等地“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总的来说，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对外军事发展基本战略是以“北进”为主。从“征韩论”到山县有朋提出“大陆政策”，从中日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从吞并朝鲜到出兵进犯西伯利亚，从东方会议到占领中国东北制造伪满傀儡国，近70年的日本对外扩张过程清楚地表明，历届日本政府都把“北进”作为主要对外发展方向。“北进”的方向与“大陆政策”是一致的，所以能够坚持长年而未变。

“北进”与“南进”两种主张的最终目的是一致的，即实现日本称霸亚太地区的梦想。其争论的核心问题是实现称霸的途径

与确定对手。由于俄国（以及后来的苏联）是日本对外扩张的最近且最大的威胁力量，为重点解决日俄矛盾，“北进”就成为日本对外扩张战略的重心。日俄战争后日美之间在东亚利益互为抵触，其矛盾有所发展，但毕竟只占次要地位，“南进”论也因此受到制约，只能作为一种辅助性政策而存在。1906年，参谋本部第二部长松石安治大佐提交的《关于国防大方针之意见》即提出向海外扩张利权、移植过剩人口的方向是：一、西伯利亚、中国东北及蒙古方面；二、菲律宾、法属印度支那及南洋诸岛；三、中南美。^①这种先“北进”后“南进”的主张在当时日本统治阶级中很有市场。这时，日本陆海军统帅部经协商后一致同意的国防方针所确定的假想敌国顺序为俄国、美国、法国，也反映了这一点。

其实，“北进”与“南进”之争也是日本陆军和海军之争。以当时的日本军事力量而言，陆军实力强于海军，日本海军与美国海军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在这种条件下，日本真若“南进”，力有未逮，在一个时期内只能以“南进”为口号推动海军扩大实力。美国制定专门对付日本的“橙色计划”以及日美关系的恶化，都为海军鼓噪“南进”提供了口实。

不过，在20世纪20年代，“北进”与“南进”两种战略主张之间也有一致点，这就是，双方都重视中国东北地区在日本侵略扩张中的重要作用。日本只有在吞并朝鲜的基础上进一步占领中国东北地区乃至长城以南地区，才能在“北进”或“南进”中处于有利的地位。中国丰饶的物资资源将会对日本扩大侵略战争具有重要的支持作用。

这一点在石原莞尔的军事思想中有明确体现。石原莞尔1928年任关东军参谋，1935年任参谋本部作战课长，负责制定国防政策，1937年升为参谋本部作战部长，是日本侵华战争的重要策划

^①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1），朝云新闻社1967年版，151—154页。

者之一。他将战争分成决战战争（即战略上的速决战）和持久战争（即总体战）两类。他认为，日本同美国的战争将会成为持久战争。在沙皇俄国崩溃以后，美国势力力图向东亚发展，日美矛盾与抗争是不可避免的，日本国防的重点必须有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从针对东北亚大陆转变为针对西南太平洋。因此，日本应从拿破仑战争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及早解决“满洲问题”，将中国东北建设成日本对美持久战争的后方基地，同时应迅速与苏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解除日本的后顾之忧，以便集中主要力量对付美国。日本不能为了眼前的小利而将“满洲”的资源消耗、浪费在西伯利亚或中国大陆，否则会引起中国人民的一致反抗，导致“满洲”根据地的崩溃。日本应将根本的着眼点放在形成“东亚联盟”上，然后再向美国挑战，当然，在把满蒙变成日本领土之后，如果依靠威吓手段不能防止中国的排日和参战，日本军队就应一举攻陷南京，占领华中以北的重要地区。^①石原莞尔后来虽然与军部其他主要成员之间出现较大矛盾，因而成为不得志的“悲剧式的将军”，但他的上述主张仍是日本战时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日本统治阶级制定对外军事战略有很大影响。

在“北进”战略的指导下，日本军国主义强占了中国东北，扶植伪“满洲国”傀儡政权，为日本向北或向南进一步扩大侵略打下基础，但在1936年二二六事件以后的数年内，日本的对外军事战略较快地由“北进”转为“北守南进”。其原因有以下4点：

其一，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后，由于世界经济集团化的趋势及日本确保石油、铁矾土等重要战略物资的需要，“南进”对日本军国主义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性日益显示出来。

其二，日本军国主义未尝不想在占领中国东北后继续“北进”，把西伯利亚的丰富资源掠为己有。从地理条件讲，这比从

^① 参见伊东六十次郎：《石原莞尔与战争学》有关章节，大溪书房：1978年版。

南洋获得资源要便捷得多。但是，当年出兵西伯利亚的失败使日本侵略者对“北进”心有余悸：各帝国主义国家的联合力量都未能将苏联扼杀在摇篮里，也未能阻止其成长壮大，日本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更难与苏联作对。在这种状况下，日本深知一旦对苏开战，不仅没有取胜希望，连它在东北地区的统治也有崩溃的可能。所以，日本政府在1936年6月修改《国防方针》及《用兵纲领》时就决定对苏联是以防为主，只要苏军不南下，日本不应主动挑起事端，而要稳住东北以利于向华北发展。11月25日，日本同德国缔结《防共协定》，其目的即在于让德国从欧洲方面牵制苏联，以减轻苏联对己的压力。此后，经1938年的张鼓峰事件和1939年的诺门坎事件，日本试探“北进”而碰壁，只好把侵略扩张的方向指向南方。①

① 1931年以后日苏在远东大陆兵力配置比较如下表：

	陆军师团			飞机		
	日	苏	%	日	苏	%
1931.9	3	6	50			
1932.9	6	8	75	100	200	50
1933.11	5	8	63	130	350	37
1934.6	5	11	45	130	500	26
1935末	5	14	36	220	950	23
1936末	5	16	31	230	1200	19
1937末	7	20	35	250	1560	16
1938末	10	24	42	340	2000	17
1939末	11	30	37	560	2500	22
1940末	14	30	47	720	2800	26

（此表引自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1），400页）。日本在远东的兵力始终不能与苏联兵力相比，这是日本统治阶级不能决定“北进”的重要原因。

其三，1936年是日本军事战略发生转折的一年。二二六事件是这个转折的标志。美国学者戴维·伯格米尼根据他所掌握的公开与未公开的第一手日本资料，认为皇道派与统制派之争也是“北进”与“南进”之争。二二六事件中皇道派势力被镇压，“北进”的主张随之退出主导地位，掌握军部大权的统制派开始大力推进“南进”战略。他还认为，天皇裕仁在镇压皇道派势力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因为裕仁认为对日本的意识形态方面的主要威胁不是共产主义而是西方个人主义，所以裕仁赞同“南进”，下命令坚决镇压叛乱部队。戴维·伯格米尼的观点值得注意。^① 1936年，日本与主要西方国家关于限制发展海军力量的谈判终于破裂，日本与这些国家的矛盾更加尖锐，它决心摆脱华盛顿裁军条约和伦敦裁军条约的束缚大力发展海军，最终以武力解决矛盾。8月7日内阁五相会议便将“向南方海洋发展”列入了基本国策，要求大力加强海军对付美国，以便开战时能确保西太平洋地区的制海权。

其四，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虎踞东亚一隅的日本受到鼓舞，它要象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那样，趁各国致力于欧洲战场之机，扩大在亚太地区的地盘，成为东亚盟主，进而称霸世界。

“南进”主张因此更加得势，成了日本对外军事战略的重心。美国制定“虹”联合作战计划，也是日本进一步重视远东地区的日美矛盾，并制定相应的“南进”军事计划的原因。尤其在德国大举进攻北欧、西欧的1940年上半年，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也开始认真研究“南进”问题，制定南方作战计划。7月3日，陆军省部首脑会议通过的《时局处理纲要》明确提出今后的方针是，在迅速解决中国问题的同时，努力捕捉良机解决南方问题。27日，大本

^① 参见戴维·伯格米尼著《天皇的阴谋》，莱奥波鲁书房1972年版日译本。这本书1972年出版后曾被赖肖尔等人批判，但若认真阅读此书，便知这种批判不见得公道。

营政府联络会议通过了这个纲要，“伺机南进”已不可止。^①

日本军国主义为了实现“南进”，急于解决中国战场的问题。但由于中国坚决抗战，日本侵略军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而不能自拔，故而向南方作战时人、财、物力均受到很大牵制。

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日本侵华战略

从“北进”到“南进”，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外军事战略的大转变，然而，无论在“北进”时期或“南进”时期，日军侵华战争始终占有重要地位。“北进”时，日本意向所指虽为苏联，实际侵略矛头却是对准中国东北。所谓“南进”，其实也包括向中国长城以南、长江以南扩大侵略，在打通中国东北到华南的侵略通道、占据中国南方大片国土的基础上，再“南进”西南太平洋地区。所以，日本的侵华战略是其整个军事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侵华战略目标的实现对实施整个军事战略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

如前所述，在20年代，“北进”与“南进”主张有一个相通之处，即都十分重视中国东北对日本的侵略扩张所具有的战略地位。在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的打击下，日本统治者为谋求出路，在加强对内镇压的同时，对外竭尽全力地扩大侵略。它所选择的目标是觊觎已久的中国东北，它要把中国东北变成日本的完全的殖民地和进一步扩大侵略的根据地。这是明治维新以来的军国主义扩张思想的继续。当年吉田松阴曾说，日本在“交易中失于俄美者由鲜满之地补偿”。^②此后历代统治阶级恪守此训，“大陆政策”源出于此。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日本军事战略思想也不能脱此窠臼，只有实现这个目标之后才能提出新的战略。

①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2)，朝云新闻社1968年版，58、59页。1941年7月，日本政府决定了“准备对苏作战、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的《帝国国策纲要》，在中国东北集结70万兵力进行“特别演习”。但是，同年4月刚签订《日苏中立条约》，这个“特别演习”仅做给德国看看而已，日本不会轻易对苏开战。相反，日本向南对美开战问题却早已提上议事日程。不妨说，这是一个“声北击南”的战略。

② 见《吉田松阴全集》，山口县教育会1935年版，第五卷，332页。

早在1921年，日本内阁决议即直言宣称：“满蒙与我领土接壤，与我国防及国民之经济生存有十分紧密的关系，以此两大利益为出发点，在满蒙扶植我方势力是我对满蒙政策的基本点。”

1927年6月，田中义一在东京主持召开了讨论决定日本对华政策的东方会议。田中义一曾被视为陆军长州阀巨首山县有朋的接班人，是日俄战争后约20年间日本政府策划军事国防的中坚分子。他是“北进”派的骨干，日俄战争后，他主张：军部的战略应与政府的策略相一致，“使日本摆脱岛国境遇成为大陆国家以期充分伸张国势”^①；在维护日英同盟的基础上，以俄国和中国为第一、第二假想敌国制定军事战略，因为俄国和中国一旦实力强大起来，都要报一箭之仇，“满洲”必将成为矛盾的焦点，日本甚至须有同时与俄国和中国开战的军事准备。基于这种认识，田中义一在东方会议上积极支持外务省政务次官森恪等人的急进主张，策划把所谓“满蒙”地区从中国分割开来。田中义一在会上提出的《对支（华）政策纲领》，集中体现了上述战略主张。纲领宣称：“对支那本土及满蒙之方针理应不同”，“如果日本在满蒙地区尤其东三省地方的特殊地位权益受到侵害，日本准备不失时机地采取适当措施”。^②

日本统治阶级的既定国策是把中国东北攫为己有，在这个基础上，北向苏联贝加尔湖以东，南向华北以至华中、华南扩大侵略，在侵略过程中通过扩大地盘、加强掠夺增加战争能力，反过来进一步支持战争。可以说，视“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利益线”，是这个时期日本统治阶级制定对外军事战略的根本出发点。所以，关于《田中奏折》问题，尽管时至今日仍有一些学者对其真实性置疑，但不容否认的是，文件提出的“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的称霸世界的三步战略，与田中义一的上述《政策纲领》是完全一致的，此后日本军国主

①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1），133页。

②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下卷，原书房1966年版，102页。

义的侵略步骤也是同这个三步战略相吻合的。这是《田中奏折》成为具有重要价值的历史性文件的基础。因此，东方会议在日本军国主义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在这个大战略指导下，日本军部还制定了更为具体的作战计划。据20年代开始在参谋本部作战课供职的河边虎四郎于战后回忆，20年代军部制定的对苏、对华作战计划是，对苏作战的目的是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北半部的主战场上击败敌方主力，进而占领贝加尔湖以东地区。为了避免中苏联合对日作战，日本须首先在东北地区对中国军队开战，将其势力逐出东北；对华北，必要时则在秦皇岛、塘沽、山东半岛登陆，占领其要地；华中方面则可在上海附近扬子江口登陆，同时还考虑到占领浙江、福建及其以南沿海地区的可能。这个作战计划并未局限于此，它甚至提出了日本侵略军沿京汉线南下，顺长江西进，两支军队在汉口互相策应作战，进而侵占中国内地大片国土的侵略步骤，其鲸吞中国的狼子野心早已暴露无遗。^①为此，1925年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烟俊六、大佐曾率领参谋本部和军令部的一批作战参谋乘军舰对上海到汉口一带的军事地形、登陆地点进行了实地侦察。由此可见，侵占中国东北并进而鲸吞中国，是日本妄图称霸亚太地区的既定方针的第一步、第二步，关东军一手挑起的九一八事变，就是日本统治阶级的这种蓄谋已久的军事扩张战略的直接产物。

然而，日本政府却宣称，九一八事变乃关东军的擅自所为，并非出自政府本意，政府是反对当地驻军的作法而坚持“不扩

^①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1），259—260页。这个计划实际上未把主要矛头指向苏联而是指向中国，因为这时苏联已经粉碎了国际帝国主义势力的3次武装干涉，将日本侵略军赶出了黑龙江以北地区。苏联开始努力恢复国民经济，因此希望尽可能避免国际矛盾激化，维持和平的周边环境，何况苏联在1919年就宣布放弃俄国在中国东北北部的特权（中东铁路除外）。苏联对日本在中国东北和大陆的扩张暂时不构成重大威胁，日苏矛盾实际上和日美矛盾一样，暂时居于次要地位，中日矛盾成为日本对外侵略扩张中必须首先予以解决的主要矛盾。因此，在这时期的日本对华作战计划中，日本的作战目标是完全占领东北。

大”方针的。这只能是徒劳的诡辩。在此无需从政治体制及历史事实上论述侵华日军与政府的一致性和配合之密切，仅就上述山县有朋提出的“开国进取”、“速战速决”的《国防方针》和日本政府（不仅指内阁，也包括军部在内）多次制定的以俄国和中国为主要假想敌国的战争计划而言，关东军的行动是与之完全符合的。1928年石原莞尔制定了日军侵占中国东北的详细计划，其中甚至包括如何制造事件以挑起战事的内容。日本的最高统治者裕仁则将此《极秘偶发事故计划》保存起来，以备制定政策时参考。^①1931年4月，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秘密成立了联合机构国策研究会议，专门负责研究所谓的“满蒙问题”，两个月后即提出《解决满洲问题方案大纲》，认为如果中国的排日行动不断发展，则应估计到日本采取军事行动的必要性。只是为了进行较充分的舆论准备，以便在采取侵略行动时能够得到国际上的援助，日本政府才希望关东军先隐忍一年，免生事端。^②在九一八事变前夕，东京各大报社接到数千个询问何时开战的电话，社会上尚且如此，日本政府更不会一无所知。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参谋本部派往东北的建川美次作战部部长正在沈阳，他与关东军首脑协商后同意在沈阳树立亲日政权，并暂时将战事局限在洮儿河、拉林河至山海关的范围内。事变消息报到参谋本部后，参谋本部认为，“关东军今次采取的行动，完全是配合其任务的适宜的行动”，并准备增兵东北，援助关东军的侵略扩张行动。事变翌日上午，日本内阁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由于币原外相提供的情报，内阁成员对事变乃关东军阴谋制造的这一点都心中有数，但内阁的决议不仅不谴责和限制关东军的行动，反而姑息纵容，决定了所谓的“不扩大”方针，关东军的行动不超过“必要的限度”即可。关东军得到政府的支持，更加嚣张，不断扩大事态，

① 索维·伯格米尼：《天皇的阴谋》，278页。

②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1），306—307页。

4个多月后占领了全东北，并很快建立了伪满傀儡政权，实现了东方会议提出的日本对外军事战略的第一步构想。

七七事变前后的日本侵华战略

日本占领了中国东北，实现了积年宿愿，这既是日本“北进”战略的大部分实现，又为日本“南进”奠定了基础。但中国人民的抗日烽火燃遍白山黑水之间，使侵略者不得安宁。日本侵略者为了继续“北进”或“南进”不得不暂时有所收敛，把巩固在东北的统治作为首要问题。为此，日本侵略军在残酷镇压中国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的同时，以武力强迫中国政府签订《塘沽停战协定》，在长城以南的冀东地区制造“非军事带”，这样既有利于日本巩固在东北的统治，也为日本下一步南侵预先准备条件。

1933年6月，陆军省和参谋本部联席召开军事会议，讨论日本的对外军事战略问题。主张北进的皇道派核心人物陆相荒木贞夫、参谋次长真崎甚三郎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讨论的结果认为：如果措施得力，日美、日英间在华利益上的矛盾能够暂时缓和，日本与中国的矛盾也不致很快激化。日本最危险的敌人是苏联。苏联的远东红军已经变得十分强大，其势力正在不断向东发展，不仅进入中国，而且威胁到日本国内，日苏间还存在着石油、渔业、边界等诸多棘手问题。日苏矛盾有随时爆发之虞。然而，日本以目前的国力与苏联直接对抗是困难的。日本如果与中国进行全面战争，不仅极度消耗日本国力，而且短时期内不可能打赢，进而可能出现其他国家联合抗日的局面。就目前状况而言，日本应努力避免使上述矛盾激化，致力于加强自身实力，巩固已有的统治。^①这一暂时克制以养精蓄锐的方针直到1936年一二·九事件前没有大的变化。“北进”的主张已有所克制。

在这一方针指导下，日本一方面在东北地区积极增强与苏联对抗的能力，一方面有限度、有步骤地向华北进犯，其作法是

^① 日本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1)，345—347、418、419、435页。

制造一个脱离南京中央政府的依赖日、“满”的第二个“满洲国”，即“积极支持华北独立自治”。

在对华战争方面，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沿袭历年的作战计划方案。1937年度提出的作战计划与过去大体相同，即分别出兵华北、华中、华南，占领平津、青岛、长江下游沪宁杭地区及东南沿海地区，但因兵力所限避免与中国打持久战和全面战争，以局部速决战为主。海军军令部则认为，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有可能使日本打不成局部战争，而会爆发全面战争，日本应有相应的战争计划。实际上，从1936年下半年开始，日本已感觉到中国抗日形势的发展于己不利，因此无论参谋本部或军令部，在军事战略转变的同时，都开始积极调兵遣将准备进一步扩大侵华了。

日本军国主义扩大侵华的方法仍是先制造事端，寻找借口。在1936年9月，日本军部便借口所谓的“北海事件”（一名不法日商在广东北海^①被杀）提出对华政策，“万一在华北发生有关帝国军队威信大事件时，驻华军队应坚决膺惩之”，彼时“军队之行动要神速敏捷，在最短时间内给以闪电般打击，以最小限度的要求局部地解决问题”。^②显而易见，侵华日军就是在这一军事方针指导下制造了七七事变的。

七七事变发生后，日本内阁五相会议决议“坚持不扩大方针”，但如果中国政府“不反省”而使事态进一步陷于危机，日本将“迅速采取适当措施”。不过，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石原莞尔对这种“不扩大方针”有明确的解释，他说：“就一般人的想法而言，不扩大主义似乎就意味着停止兵力动员，但这样做会造成前线混乱，而且派兵需要数周时间，所以，即使希望不扩大，进行兵力动员在形势紧迫时以防万一也是必要的”。^③可见，日本政府的所谓“坚持不扩大方针”是妄图欺骗舆论的手段，也是争取时机进一步动员兵力扩大侵略的障眼法。

① 北海市已于1965年划归广西省。

②③ 日本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1），345—347、418、419、435页。

1937年7月11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决定向华北增派兵力，所谓“坚持不扩大方针”的说法不攻自破。日本扩大侵华战争的策略即如前述历年的对华作战计划中所制定的那样，一方面在华北扩大战果，一方面深入中国腹心向华东、华中地区进犯。15日，侵华日军制定了作战计划，第一步占领平津塘地区，第二步将兵力推进至保定、任邱一线，乃至石家庄、德州一线，同中国军队进行决战。为此，军部积极增兵华北，组成寺内寿一大将为司令的华北方面军，准备在保定、沧州同中国军队决战。8月13日，日军进犯上海，并开始轰炸南京、南昌、汉口。日本妄图以“全面打击”使中国军队丧失战斗能力，从而在短时期内（甚至在一个月内）结束战事。日军由于在华北地区进展顺利，便将主要力量集中到华东和华中。11月7日组成松井石根大将为司令的华中方面军，分兵两路从长江下游吴淞口一带和杭州湾金山卫登陆发起进攻，投入兵力已达到9个师团之多。经过激烈的战斗，日军采取铲土机式的数路并进的战术，冲破了蒋介石预设的数道防线，最终合围南京。12月13日南京陷落。日本华北方面军也在1937年底大体侵占了黄河以北地区。

日本扩大侵华初战得手，便又玩弄政治手腕，为整顿充实军队提供时间，为下一步侵略制造借口。1938年1月，日本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了一系列蛮横无理的要求：要中国政府“正式承认满洲国”，“放弃排日反满政策”，在华北、内蒙和华中设立“非武装地带”，承认地方汉奸政权，日本可以在这些地方驻军，上海由中日两国共管，中国向日本赔款等。中国政府和人民显然不能接受这些丧权辱国的条款。中国人民的抗日决心并不因为部分国土沦陷而有丝毫的动摇。于是，1月16日日本政府声明“不以（中国）国民政府为对手”解决中国问题，而要扶植一个与日本“真正提携的”“新兴中国政权”。到4月初，日本统帅部已认为：日中之间的持久战不可避免，而以当时日军占领地现状而言，几乎不可能打这场长期战争。因为从地域面积、人口、资源等方面看，

当时的状况尚不能“以战养战”，不能实现“战地自给自足”，故需扩大战线，将蒋介石政权驱逐至偏远之地，日本进而占据有利态势。为实现这个目的，日本应坚决进行徐州、武汉、广东等地的进攻战。4月，日军攻打徐州，中国军队在台儿庄一带击溃进犯之敌，大挫日军的嚣张气焰。日军虽然在5月20日占领徐州，但其南北夹击、包抄合围中国军队主力的目的并没有达到。此后，日军调师西进，切断京汉线，分三路沿京汉线、淮河、长江向汉口推进。10月26日，日军占领汉口，此前，广州也已沦陷。日本军部之所以策划同时拿下汉口和广州，是为形成对中国军队的南北包围利于短期内消灭中国军队主力。但是，日本侵略军最终未能实现以速决战消灭中国军队主力的目的，不得不同中国打一场它极不情愿的持久战。

地域广袤的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战场之一。中国抗日战争牵制了日本大部兵力，1941年以后侵华日军常在130万左右，最多时1945年近200万。日本军国主义扩大侵华战争，虽然一度占领了中国大片国土，但它每前进一步就接近坟墓一步。无论它制定出什么样的战略战术，都改变不了其必然失败的命运。

考察日本侵华战略方针的全部演变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对外扩张的“北进”或“南进”军事方针，是制定侵华战略的基本依据；同时，日本侵华战略的实现与否，又对“北进”或“南进”军事方针重心选择，产生重要的影响。无论日本选择“北南并进”、“北进为主”、“北守南进”或“南进为主”几种主张中任何一种对外扩张军事方针，都必须首先完成对中国东北、对全中国的占领。但是，日本既然被迫陷入中国抗日战争的泥潭，就再也无法完成“北进”或“南进”，从它侵略中国的开始，就注定着它的对外扩张必然彻底失败。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